

深化未成年人司法理念更新 全面强化未成年人刑事保护

前沿话题

□ 聂一雄
□ 本报记者 蒋安杰

近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未成年人检察研究中心、涉外刑事法治研究暨人才培养协同机制协办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全球视野与中国实践”国际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参会人员围绕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的热点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许永安在致辞中表示，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加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既是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当今各个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共同课题。倡导学术界和实务界要持续加强合作，共同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这一崇高事业而不懈努力，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修改完善提供建议，进一步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沃晓静在致辞中表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事业征程壮阔、任重道远，学院未来将进一步发挥法学学科的传统优势和中国人民大学作为综合性大学的跨学科资源，为构建兼具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提供学理支撑和实践指引。

推动涉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理念发展与实践创新

理念是实践的先导，涉未成年人理念的发展革新对

于涉未刑事司法顶层设计与各地实践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也是应对未成年人犯罪新特点、新挑战，推动犯罪治理现代化的必要要求。

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周勇认为，应首先厘清未成年人刑事保护的类型，以实现分类施策、精准保护。一般可以分为未成年人作为犯罪受害者和未成年人作为加害人两种类型，对于前者即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运用刑事司法手段严厉打击，对于后者在运用刑事司法干预时除惩罚之外要重点关注预防再犯的问题，此外亦不可忽视实践中未成年人同时作为受害者和加害人的特殊类型。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姚建龙表示，四十年探索形成的成功经验包括形成少年司法专门理念、专门立法、专门机构、专门程序，专门处遇五大方面，应在这些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研究与探索。

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厅厅长楼杰详细介绍、回顾了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总结中国特色未检工作经验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立足国情、坚持制度自信、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坚持综合履职、坚持标本兼治，全面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促进解决涉未案件背后的社会治理问题，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及其犯罪预防、治理工作中展现出了蓬勃的生机和巨大的优越性。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徐猛提出，涉未司法保护应坚持理念先行，由将未成年人视为被动保护客体的传统观念，向拥有独立人格和完整权利的积极主体转变，在司法程序中尊重其主体地位及个人意愿，同时把握未成年人的特殊性，通过适应其认知水平的方式保障其充分参与权。

法律文化

□ 何勤华 张顺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与法律文化的核心命题，“天人合一”观念蕴含着十分深刻的生态伦理与自然智慧。千年以来，中华民族追求一统的民族心态以及视野宏大的统一观与整体观，从某种程度上都源于原始的“天人合一”观念，这种思维模式不仅深深凝聚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中，也持续影响了传统文化与法律思维的历史发展。回溯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在传统律法中的规范性表达，并将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转化为当代的具体法律制度，不仅能为当下的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提供本土化理论支撑，亦有助于积极推进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

“天人合一”的法律意涵与传统法表现方式

理解天人合一之内涵，首先需要明确“天”的涵义。古人认为，“天”主要包括两层涵义：一是指物理学意义上的天，即与地之对应的客观存在；二是指相对于人的客体世界，包括自然物、自然法则、命运甚至人类观念中存在的神灵等外在力量。传统法律思想中的“天”并非仅指人格化的神灵，而更指代客观的自然规律与宇宙秩序。《周易·乾卦》中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可以说是“天人合一”观念在法理层面的最高表达。古人认为，“天道”是“人道”的渊源，因此法律的合法性并不源于统治者的恣意，而来源于对自然秩序的遵循与顺应，这无疑预设了人类法律必须符合自然正义。“天人合一”观念代表了中华民族自古及今的一贯追求，也是儒道墨三家共同认可的基本精神之一。传统法理学认为，自然界中存在的风调雨顺等和谐现象与人类社会中出现刑措不用等治乱现象是相互呼应的。例如，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说在客观上限制了皇权的无限扩张，要求统治者必须敬畏天道、遵循自然规律治理国家，确立了中国古代法的根本特征。

在制度层面，“天人合一”通过与礼法互动转化为一套严密的法律规范体系，体现了古代制定法与自然法之间的高度融合。首先，“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资源保护思维在历代律典中均有体现，如《礼记·月令》中针对不同季节的禁忌与许可的详细规定，《唐律疏议》中惩处违时狩猎、乱砍滥伐行为的专门条款，不仅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早期萌芽，更体现了古代法对自然的敬畏。其次，“顺天行罚”的刑罚时令制度，即要求司法诉讼程序依自然法则适时安排，不得随意对罪犯处以刑罚等规定。例如，自西周时期就存在的“赏以春夏，刑以秋冬”的司法原则，持续影响了古代司法长达三千多年，可以说是“天人合一”观念在程序法中的典型应用和对古代法律活动最直接影响。最后，“德主刑辅”观念进一步法律化。中国古法代中所指的“德”不仅代表着人伦道德，同时也代表了天人伦理，破坏自然也会被视为“失德”，进而会招致天谴或法律制裁。可以说，古代法中对于“天人合一”观念的融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成文法的滞后性缺陷，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辅助构建了古人内心确信与法律外在强制相结合的古代法秩序。

“天人合一”的当代法律转化路径

要使“天人合一”观念从古籍走向法典、从哲学走向判例，必须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构建更适应当代中国的自主法律制度体系。



中国刑法的基本理念



精品书摘

□ 高铭喧（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现代刑法理念高度重视人权保障机能，以实现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的有机结合。中国刑法学的研究，曾以符合立法和政治需要为原则，这种工具刑法观，不仅阻碍了刑法理论的更新和发展，而且使刑法立法缺乏长远预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刑法的价值观念逐渐从过去对社会利益、公共秩序的单纯强调，转变为社会保护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并重。21世纪的中国刑法应当以人为本，注重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实现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动态平衡，最大限度地发挥刑法的功能，但这绝对不是对人权保障的片面强调和对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的完全否定。

在当今社会刑法的发展，一方面，中国刑法应当着力发掘刑法理念传统资源，中华法制文明源远流长，其中不乏诸如“明德慎罚”“矜老恤幼”“宽刑重教”“宽猛相济”等值得后世传承的刑法理念。要善于从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着力发掘刑法理念传统资源，但也要警惕传统落后的刑法观念，如形成于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刑法万能主义、刑法工具主义以及重刑主义。另一方面，审慎对待域外新兴刑法理念。在当代中国刑法理念研究的过程中，长期存在一种将域外刑法理念直接转化为中国刑法理念的倾向，它基本上忽视了中外社会的发展状况以及法律文化传统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试图通过对刑法理念的普适性进行深入阐述，论证其在当代中国刑法制度的设计以及刑法技术的操作中全面贯彻的合理性。

刑法理念作为扎根于本国刑事法治实践的价值观念，在具有普适性的同时，也具有极强的地域性特征，不能因为过分推崇其普适性而湮没其地域性，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本本主义不足取，教条

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早期干预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大量案例表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发生与其成长过程中的权益保护状况密切相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持续加重与早期干预不及时息息相关。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犯罪学研究所所长于国旦提出，需进一步审视少年罪错行为的内部构造，应以法益侵害性及要保护性两个要素为基础进行构建，两个要素中要保护性应居于首要位置，在此基础上把握少年罪错与犯罪行为的本质区别和倡导保护处分的优先，在保护处分无法取得效果时再考虑给予进一步的治安处罚乃至刑事处罚。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亮认为，综合治理方式应该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中被进一步提倡和践行，一方面犯罪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针对单一因素的预防措施效果往往无法达到最佳，另一方面综合治理方式的引入和践行也是国际准则的要求。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司法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贾太雷认为，未成年人矫治教育工作是我国人权建设领域实现罪错未成年人群体司法公正及其发展权保障的重要内容，目标是实现罪错未成年人的矫正教育权，工作过程中要坚持协同、高效、专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工作理念上需要由关注公共利益向关注共同利益、由正式控制向非正式控制、由引导遵纪守法向培养社会有用之才转变。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殷海青详细解读了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刑法对于治理未成年人轻微犯罪带来的影响。



手段性，即刑法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其功能是有限的，不可将维持社会秩序的任务完全指望刑法去完成，刑事控制模式应以犯罪的相对性与刑罚的经济性为基本理念，不求彻底消灭犯罪，但求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开支将犯罪最大限度地控制在社会能够容忍的限度之内。因此，必须破除重刑主义与泛刑罚化的观念，建立一个实现刑罚资源的最佳配置并能取得遏制犯罪的最佳效果的现实型刑事控制模式。

整体来看，社会历史形态的变迁决定刑法制度的进化命运，全球风险社会与网络社会的交替交织孕育了当代刑法积极预防风险的时代任务。预防性刑法观念应运而生，为当代刑法功能的适度扩张提供新的理论导向，以犯罪化、危险犯配置、安全价值位优、刑罚积极预防等为特征的预防性立法是集中具象。

当前，风险社会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安全政策日益完善，2021年，在中共中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景下，总体国家安全观对我国当代刑事法治体系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也为刑事治理能力与体系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新能量与新指标。当代刑法肩负积极有效贯彻安全政策，保障国家安全安全的特殊使命。

诚然，安全价值的地位提升，进一步促使当代刑法更积极、主动地保障国家安全，安全刑法是因安全政策变动的产物，显示刑法功能投放的侧重点。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应设定科学的安全刑法观，推动安全刑法的有序演进与发展，但安全刑法仍应当以保障自由为前提，自由的行使不应当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之间出现明显的冲突或决裂。总体国家安全观导入当代刑法后，并不会改变现代刑法的基本属性、功能定位、价值多元化的立场。要警惕并消解与自由刑法的紧张一面，应审慎把握，在“克制”安全刑法的功能异化上，应当着重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坚守罪刑法定原则和保障人权的底线，不能无限扩大刑法立法权与司法权；二是出于防控社会风险的考虑，国家可以制定具有前期化或早期化的法律，严密法律规制体系，强化国民的遵法认同感与规范“合规”的意识；三是自由刑法与安全刑法各自的实践体系之间应当秉持比例原则，维系自由与安全之间的权衡。在冲突无法消解的情况下，应当由宪法进行审查并最终决定取舍。

当下，结合总体国家安全观勾勒当代刑法重构安全保障体系的基本线索，需围绕热点重点安全等课题，有序构建反应机制，应当正视刑法工具属性的客观性与刑法功能主义的发展性，以比例原则控制极端工具化的异变，应当体认社会变迁引发犯罪形态结构变化的基本规律，联动犯罪学与规范刑法学，以刑事政策的理性化推动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科学性，应当重新认识刑法谦抑精神，倡导刑罚有效的必要制裁功能观，适度释放刑罚有效性的预防潜质，但不论面临何种安全挑战，均不能松动人权保障的红线与底线。

（文章节选自《中国刑法理论的体系建构》）